

12.09
李德英

青陽史話



第三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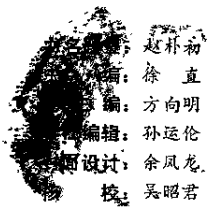


政协青阳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青 阳 史 话

第三辑

政协青阳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

主 编：赵朴初
副 编：徐直
编 者：方向明
编 辑：孙运伦
图 设计：余凤龙
校 对：吴昭君

青阳史话 第三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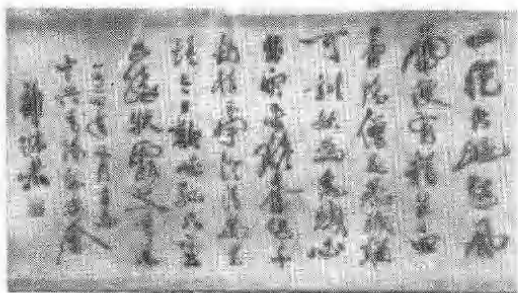
编辑：政协青阳县文史委员会
出版：

出版时间：一九八六年十二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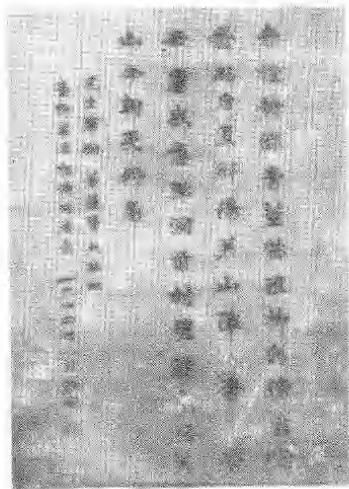
承印单位：青阳县印刷厂

安徽省出版总社皖非出字(86)第2116号

Yt234117



郭沫若 墨迹



黄忠学 摄

著名作家老舍 墨迹

政协青阳县第四届委员会文史委员会

主任委员：徐 直

副主任委员：方向明 韦 伟

委员：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王传璋 王善政 孙运伦 吴兴华 柯天霖

钱华贵 黄国正 黄忠学 舒庚正 盛春喜



（自左至右）

黄国正 钱华贵 吴兴华 舒庚正 黄忠学（后排）

吴昭君 韦 伟 柯天霖 徐 直 孙运伦 方向明（前排）

目 录

革命先觉 纺织专家

- 记陈维祺同志一生的光辉业绩……………张新国（1）
陈文坤传略……………江伯骧（13）
革命游击战争中的尹彬同志……………孙运伦（23）
党的事业忠诚战士——田维祺……………黄 新（28）

- 吴家元烈士的光辉一生……………张新国（33）
程新荣烈士传略……………张新国（39）

烈火真金 高风亮节

- 记为扑灭火灾而献身的严秀英烈士……………钱华贵（45）
愿为祖国洒尽最后一滴血
——记对越作战一等功臣陈寿华烈士事迹……………张新国（50）

- 我对陈次权先生的回忆……………王镇国（56）
陈次权是怎样当上国民党青阳县党部书记长的…郑 汉（65）
陈次权巧斗唐克南轶闻……………孙明达（69）
回忆我的父亲谢汝昌……………谢永铸（81）
先父徐鸿毛赞助革命事略……………肖豪、慰民、小璐（89）
革命的盟友——郑康人先生……………程学明（92）
我们对父亲孙梅先的回忆……………辛伯、仲彬（95）
开明士绅罗晓松……………程学明（100）

- 现代名人青阳行踪纪实……………吴兴华（102）
忆陈毅同志在青阳的一次讲话……………程学明（112）

缅怀洪诚教授·····	史效一 (114)
回忆祖父李仲芬·····	李冠群 (118)
对祖父经商的回忆·····	宁攸禹 (121)
梅半街的创业者——梅流江·····	倪念珠 (124)
沈联芳与大有蚕种场·····	倪念珠 (127)
天柱峰下一学者——施下之·····	王鸿如 (130)
乡贤——姜孝维先生·····	姜志清 (132)
书苑之秀——施玉藻·····	王鸿如 (134)
✓ 光绪《青阳县志》主纂者——周贊·····	孙运伦 (137)
✓ 九华山又方法师·····	孟庆国 (140)
爱国牧师——汪愷成先生·····	朱存德 (147)

民间老艺人——施有根····· 王善政 (451)

李席余先生事略····· 李超然、王鸿如 (154)

地方恶棍——陈浩如····· 孙万成 (157)

陈瑛其人····· 王善政 (162)

僧宝严····· 孟庆国 (165)

附录:

林森上九华山见闻琐记····· 刘子成 (168)

补白:

诗词选抄

(1) 许章法三首 (2) 谢汝祥一首 (3) 黄河二首

(4) 宁叙言二首 (5) 牛尚思一首

后记····· 编者 (171)

革命先觉 纺织专家

——记陈维稷同志一生的光辉业绩

张新国



1984年1月6日，陈维稷同志与世长辞了。享年八十二岁。这位从事纺织工作半个多世纪的革命老人，生前曾任全国政协常委，全国工商联常委，中国民主建国会顾问，纺织工业部副部长，中国纺织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。几十年来，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，为中国纺织工业、纺织科研事业和纺织教育事业的发展，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与才智。

(一)

陈维稷同志乳名益龄，字次谦，1902年农历九月初四诞生于安徽青阳县杨田梅溪村。兄弟姊妹六人，陈维稷排行第三。父亲陈啸青，字嘉言，民国初年，啸青先生曾先后两度出任福建康平、仙游县县长，后辞职回家，从事教育，在梅溪村资助设立小学一所，免费招收本族子弟和佃农子弟，对当地文化教育事业有过一定影响。母亲施氏，家庭主妇。陈氏家大业大，是青阳东乡里的名门望族。

陈家世代书香，对子女要求极严。陈维稷六、七岁时，即

入私塾读书。他天资聪颖，自幼勤奋好学，加之有父兄辅导，因而数年之间，学业上很有长进，尤其是国学基础扎实，能书善文，深受父辈及师长的器重。

陈维稷同志寒窗攻读之日，正值旧中国外患频仍，民不聊生之时，他目击内忧外患之严重，逐渐萌发救国大志。在潜心博览群书的同时，积极走向社会，向一切有知识的人求教。

1917年，他考取了上海“沪滨英文学校”，继而转到大同学院（后改为大同大学），攻读数、理、化和英文。1918年秋，他考取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，毕业后，升入复旦大学化学系。在此期间，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，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发生的“五四”运动，更加促使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觉醒。当时，《新青年》主编陈独秀和其他一些进步人士经常到复旦大学发表演讲，传播新文化思想。该校中文教师邵仲辉（即邵力子）上语文课，也有意识地向学生灌输进步思想，并在《民国日报》的《响导》副刊上发表抨击时弊、提倡改革的文章，很有吸引力。陈维稷同志很快成了进步书刊的热心读者。从而开阔了政治视野，扩大了知识面，逐步认清了当时政治腐败、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，并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。当时，在他看来，要救国于危亡，拯民于水火，最根本的是要努力学习和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，兴办实业，才能使中国兴盛于天下。因此，他抱着“实业救国”的理想和进一步丰富自己知识的强烈愿望，大学尚未毕业，就争取家庭的支持，毅然于1925年春自费赴英国留学。

在伦敦，陈维稷同志巧遇李连山（冯玉祥的内弟），并和李一同考上英国北方的里兹大学，专攻纺织印染。这时，我国北伐战争方兴，他对此感到激动和振奋。他在学习专业、补习英文的同时，经常留心国内时局，并通过在英的进步同学，看

了一些政治书籍，诸如《共产党宣言》等。由此加深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，为他后来从事社会政治活动，走上革命道路，打下了思想基础。

1928年秋，陈维稷同志结束了在英国的学习，前往德国大德染料厂进行实习，于1929年回国。从此，他结束了学生时代的生活，开始走上社会生活的征途。

(二)

陈维稷同志回国后，起先走的仍是“实业救国”的道路。他在上海办了个家庭小型针织厂，想通过办实业来救国救民。可是不到一年，针织厂倒闭了。残酷的现实，使他逐渐感到“实业救国”的道路在当时的社会是行不通的。于是，他不得不改行，从事教育工作，走唤起民众的道路。先是应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之聘，出任该校化学系教授；后又接受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系主任罗听余的聘请，赴该校纺织系任教，时至半年，陈维稷同志仍回到上海暨南大学执教，同时兼任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。不久，又应南通学院之聘，出任该校染化系教授兼教务长。陈维稷同志在各大学教学工作中，均能理论联系实际，深入浅出地进行讲授，并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，因而倍受学生欢迎。在他执教期间，正值我国人民抗日热忱日益高涨之时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，得到了各界人士的拥护。陈维稷同志也正是在这个时候，思想活跃起来，开始走出课堂，奔向社会，从事革命活动，并随着时代的潮流不断前进。

当时，他除了与安徽同乡吴云村、方彬（即方向明）等左派进步人士加强联系，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外，还曾在1934年3月，与李连山同赴泰山会见冯玉祥，利用亲戚关系（陈维

稷的六妹陈维仪嫁给了冯的内弟李连山),做冯的思想工作,动员他联合抗日,并要求冯出钱在上海创办刊物,作为抗日宣传的阵地。几经商谈,冯玉祥终于同意出资。不久,陈维稷和李连山返沪,经与中共地下党员肖明(解放后,曾任北京市总工会主席)和吴化之(曾任北京对外文委副秘书长)共同商定创办一种综合性刊物,取名为《起来》。通过《起来》唤起民众,抗击日本侵略者。后来由于冯玉祥断绝资助,陈维稷同志就拿出自己教书的工资,创办了另一份小型刊物,名为《天下日报》,宣传抗日,他和吴云村、陈丕士、钟鼎文等同志担任编辑,撰稿的都是一些进步人士和左派。为办好《天下日报》,陈维稷同志耗尽了心血,他白天讲课、开会、与人接触,晚上伏案改稿、撰文到深夜。他几乎掏出了自己的全部工薪,常常弄得一家人缺吃少穿,生活十分清苦。后来,《天下日报》虽因经费问题被迫停刊,但它的进步影响是深远的。由于当时抗日形势已经形成,宣传工作任务发生了变化。为了把宣传工作推向国际,陈维稷同志就参加了救国会国际宣传部的工作,他花了极大的精力,编写了题为《日本侵华年表》的英文册子,利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向世界人民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行径。接着,他与陈丕士合作,根据有关报纸材料,又编写了题为《日机疯狂轰炸在中国》的英文册子,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淋漓尽致地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,唤起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。

1937年“八一三”淞沪抗战爆发后,上海人民欢欣鼓舞,奔走相告。不久,上海沦陷,大批爱国学生挥泪南下。这时,陈维稷和救国会国际宣传部的郑森禹、王纪元等同志仍坚持战斗在上海。直至是年十二月,为避免不利局势,寻找战机抗击日寇,陈维稷同志首先让他的家眷返回安徽青阳家乡。随即

他与郑森禹、王纪元以及国际宣传部其他若干人员转入香港，继续开展国际宣传工作，坚持斗争。

1938年3月，陈维稷同志收到家信，得知妻子身患重病，要他速回故里。由于当时在香港工作难以开展，加之思妻心切，遂撤离香港回到家乡。当时，方向明同志在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（与陈维稷家乡杨田梅溪只相隔几十里）工作。他得知消息后，很快就去青阳会晤陈维稷，并约陈到新四军军部与袁国平、李步新同志见面。接着，陈维稷同志应新四军军部邀请，向当地军民作抗日救亡报告。他满怀激情，慷慨陈词，使与会同志受到了巨大的感染和鼓舞。随后，他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安排，留在青阳开展工作。在开辟青阳工作中，陈维稷同志首先与青阳县县长操竹友建立了统战关系，以教授身份同他合作来开展民众运动，取得操的支持。不久就成立了青阳县民众动员委员会，由操竹友担任主任委员，陈维稷同志担任副主任委员，吸收一些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参加委员会工作，在委员会领导下，还成立了工作团和儿童团，组织大批青少年学生到各个乡村巡回演出革命话剧，教唱抗日歌曲，宣传抗日道理，以此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。与此同时，通过开明士绅陈维奭（即陈维稷的二兄陈次权，解放后，曾任芜湖市副市长）的关系，并经县自卫团团总孙开梅的默许，把新四军军部有关军事干部引进青阳地方武装帮助和指导工作，以扩大党的影响，促进地方武装的转变。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，既团结了一批上层民主人士，建立了地方抗日武装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又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骨干，不少同志加入了党的组织。1939年春，由袁国平、方向明同志介绍，经中共皖南特委批准，陈维稷同志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为特别党员。从此，他更加积极勤奋地为党工作，

青阳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，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恐惧和仇视。1939年夏，调走了青阳县县长操竹友，派来CC系分子莫寒竹充当青阳县县长，动委会的活动受到限制，摩擦逐渐加剧。为了避免不利势态，组织决定派陈维稷同志去重庆工作，其他有关人员也作了相应安排。

陈维稷同志到达重庆后，与徐冰同志单线联系。当时，由徐联系的还有叶绍南（即孙大光）。他们三人每两周见面一次，由徐负责传达中央指示，介绍时事，布置任务。不久，陈维稷同志根据党的指示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利用与冯玉祥的亲戚关系，以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的名义，赴豫东汪伪军张岚峰处做策反工作，向汪伪军宣传形势和我党的政策，指明出路，敦促他们弃暗投明，为我方努力争取了进步力量。

在重庆的这段时间里，根据党组织安排，陈维稷的主要任务是在时局紧急的情况下作掩护革命同志的工作。为了不暴露自己党员身份，更好地从事地下活动，他通过在重庆工作的师生和同学关系，经组织同意，先后担任了重庆合作事业管理局物品供销处协理员，和民治毛纺织厂总工程师。以官方学者、专家的公开身份出现。他曾利用这一公开身份，接待和掩护了许多地下工作人员和党的领导干部，并在他的妥善安排下立足于蒋管区开展对敌斗争。

（三）

1945年8月，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，宋子文派人在重庆组织班子，大肆招揽纺织技术人员，筹备成立“中国纺织建设公司”，为接收日本在华的纺织工厂作准备。经同学介绍，陈维稷同志也加入了这个行列。他于是年十二月到达上海，担任

上海第一印染厂厂长。1946年8、9月间，被调任中纺公司总工程师。1947年7月，受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王之卓之聘，兼任该校纺织系主任。在此期间，陈维稷同志始终没有间断与党的联系，并不断接受党的指示，以秘密党员身份继续从事地下活动和统战工作。当时，上海正处于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中，到处都有密探的眼睛，地下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陈维稷同志就利用中英文化协会秘书的公开身份，经常召集纺织界广大工程技术人员中的进步分子，以及一些纺织厂开明的厂长，在汇丰银行楼上的中英文化协会这一不为国民党注意的地方聚餐，开秘密会议，宣传当时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，传播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。有时借孟德兰路护国寺为掩护，举行聚餐座谈，传达贯彻党的指示，但更多的是做个别工作，争取上层人士，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引导，教育、帮助他们认清形势，向党靠拢，迎接解放。为团结纺织界广大技术人员，扩大革命力量，1946年秋，在他和桂实之、苏延宾、顾龙桂等同志的发起和筹划下，还成立了一个党的外围组织——“中国纺织事业协进会”。该会采取秘密组织形式，个别串连，吸收靠近党的积极分子，由成立时的十人发展到九十余人，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，利用各种方式，开展革命活动。在这一时期，陈维稷同志还接待了前来上海从事地下活动的我党领导干部，积极为其提供方便和工作场所。

1947年初，中共中央决定在蒋管区开辟“第二战场”，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。不久，中共华东局国民党地区工作部成立，方向明同志被任命为该部驻上海工作组组长，于五月秘密来到上海，首先与陈维稷同志取得联系，陈维稷马上为方搞到一张正式居民证，将他安排在陈维霆同志（即陈维稷的五弟陈次泽）家定居，从而使方有了立足之地，为他在沪开展地

下活动创造了良好条件。余纪一、李有白、吴文瑞、张石平等党的干部，也都得到过陈维稷同志的接待和护送。在第一次“国大代表”会议期间，陈维稷还先后两度陪同方向明赴南京搜集敌人情报，有时方向明同志不在上海，陈维稷同志替他处理有关事务，筹备活动经费，转递信件，互通情况，协助上海工作组做了大量工作。他还经常为解放区采购某些物资，支援解放区人民的革命斗争。

1949年1月，党的皖南游击队胡明同志派人携带约有一斤重的金首饰，由方向明转交陈维稷，请他为游击队购置两部电台，以解决部队急切需用。由于电台及其部件是军用物资，不仅当时极难买到，而且要承担起很大风险。陈维稷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，以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感，毅然通过在上海工协工作的一名英国人的关系，向联合国救济总署买到了两部电台，由陈维霆同志取回。当即陈维稷夫妇和方向明同志将电台装诸皮箱之内，安放在陈维稷客厅的沙发背后，并拟于一月十九日上午，仍由陈维霆同志乘专车负责护送到指定地点，当面转交我游击队同志。可就在这天午夜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，陈维稷同志被国民党特务抓去，同时被捕的还有苏廷宾同志。

陈、苏这次被捕是由于杨须知的出卖。杨在浙江衢州汤恩伯总部的指挥所关押期间，受不住严刑，供出了自己参加皖南游击队的经过以及方向明与陈、苏的关系，致使上海警备司令部得知衢州汤总部电告后，连夜派特务去陈、苏家搜捕，当时由于敌人在逮捕证上将“陈维稷”错写成“程维稷”，陈维稷同志便趁隙抗辩，据理力争，弄得敌人狼狈不堪，不得不改变态度，只好说：“请陈先生去警备司令部谈谈”。鉴于此情，敌人不便再作仔细搜查，加之客厅里灯光暗淡，放在沙发后面的电台安然无恙。

陈、苏被捕后，敌人立即组织审讯，追查他们与“民盟”和方向明的关系以及活动情况。陈、苏矢口不谈任何问题，坚强不屈地抗辩，使敌人一无所获。在他们被捕的第二天，湖南长沙《大公报》率先披露了消息，接着，上海各有关报纸也作了报道。党组织派人四出奔走，积极开展营救活动，上海交大学生密切配合，组织游行队伍，向警备司令部“请愿”（实际上是给当局施加压力）。陈大庆（司令）被迫出来披见，婉言解说。当时，蒋介石引退“下野”，李宗仁上台吮诺大放“政治犯”。在这种形势下，由中纺公司总经理顾毓泉出面担保，陈维稷和苏延宾被关五天后终于胜利获释。陈维稷同志出狱后，被护送到解放区，两部电台也在党的周密安排下安全地运到了皖南游击区。

（四）

1949年5月27日，上海全部解放，陈维稷同志随大军南下，参加对官僚资本中纺公司的接管工作，并担任接管该公司的军事代表室顾问，负责财产清理。不久，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轻工业处顾问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于1949年11月，被调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，分管科学技术、纤维检验、教育、出版、援外等方面的工作。除协助主要领导同志参与决策外，对于纺织工业的发展规划和技术进步，对生产管理中各项定额、标准、规程的制定以及纺织工业科学研究的开展，都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。

陈维稷同志知识渊博，作风严谨。建国初期，他就提出要踏踏实实抓好纺织生产的基础性工作。在他的支持和推动下，我国纺织工业在当时就制定了一套技术经济指标，总结和推广了各项先进工作法，开展了工艺研究和生产设备的选型定

型，都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果。他十分重视纺织原料的研究和测试技术的提高，把纤维检验标准的制订作为一项重大任务亲自抓起来。他在主持援外工作中，对我国支持缅甸的纺织厂建设项目，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，把缅甸出产的棉花运来先作试验，据以制订工艺设计和设备方案，使这一援外项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为了支援第三世界国家的纺织工业建设，他又提出要设计制造小型的成套染整设备，适应生产各档品种的需要，以符合他们的国情。

陈维稷同志为科研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。早在五十年代，他就提出要摸索纺织新技术、新工艺，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水平。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关心并抓住新型纺纱、新型织布的科研工作，使我国纺织科研事业有了很大发展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在他提议并组织下，多次召开了新型纺纱和新型织布的学术讨论会，使我国的新型纺织研究和开发取得了很大成就，从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，达到了相当的规模，有的已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，这与他的卓有成效的指导和辛勤耕耘是分不开的。他还亲自组建中国纺织工程学会，团结广大科技人员，开展学术活动，多次出国考察，组织和领导有关国际纺织科技的交流。他曾历任一、二、三届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，受到全体会员和广大纺织科技工作者的拥护和爱戴。为了培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的新一代领导人，1983年秋，在第四届理事会组选前夕，他恳切要求不再选举他担任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理事长，并表示全力扶植新干部“上马”，帮助他们确定学会的工作方针和任务，虽经大家一再劝留，但他仍坚持个人意见，所以在第四届理事会上一致推举他为名誉理事长，仍希望他对学会重大事宜一如既往地过问和指导。

陈维稷同志尊重知识，珍视真才实学。1954年春，他